

·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历史学卷

(下)



浙江教育出版社

C53
B715.1/25
:3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历史学卷
(下)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 历史学卷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委会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5. 2(2005. 8 重印)

ISBN 7-5338-5228-1

I. 中... II. 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史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140 号

责任编辑 张晓夫 责任校对 雷 坚
装帧设计 李 珺 责任出版 陆 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历史学卷
本书编委会编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375 插页 18 字数 1620000

2005 年 2 月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

ISBN 7-5338-5228-1/C·13

本卷三册 定价: 96.00 元 全套 5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

(续编)编辑委员会

名誉总主编

于光远 季羨林 蔡尚思

学术顾问

任继愈	王元化	吴树青	江 平
徐中玉	李慎之	黄 达	章开沅
张岂之	王 宁	陈光中	汪 熙
资中筠	张仲礼	钟敬文	袁贵仁

学术编委

纪宝成	江 蓝 生	陈平原	王缉思
俞荣根	徐显明	葛剑雄	曹建明
黄 进	林崇德	张文显	蔡建国

执行总主编

杨玉圣

执行副总主编

刘雪枫 任士英 仲伟民

责任编辑

张晓夫

本书简介

本书主要选收 1994-2000 年间毕业于我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之博士、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生教育的辉煌成果，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全书凡 150 篇，分为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为便于读者阅读和学术交流，对于入选之论文，均请作者作了精心的修改或必要的调整，有关情况详见各篇题注。



本书列入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热月反动与革命文化*

高 毅

引 论

(一)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当代法国大革命史学的一个崭新的热门课题。在 1986 年 11 月美国巴尔的摩的一次国际法国革命史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里,长期在法国革命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阶级”的理论渐渐消隐了,而作为它的对立物的“政治文化”理论却在蓬勃兴起,目前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1]事实上,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国际史学界从 1986 年开始,连续三年分别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召开了三次大型学术讨论会,而三次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

有关法国革命的这种政治文化研究热的出现,应该说是和 70

* 本文节选自作者博士论文(导师为张芝联教授)引论、第一编、第二编第 1、3 章和第三编第 3 章、结语。

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上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的。但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政治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简单的辨析。

“政治文化”本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流行术语。关于这个术语,美国学者加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定义最具权威性: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2]

这个政治文化概念显然具有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集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集体主观取向;第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集体政治心态形式的影响;第三,它重视集体政治心态对于个人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而所有这些特征,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它突出地表明了人民大众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我们知道,重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是西方 20 世纪历史学不同于 19 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 20 世纪西方最主要的史学流派便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其最重要的理论特色则是它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时间三分法,亦即所谓长、中、短三时段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历史中活动的各种因素,可以按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发挥作用的大小,分别划归三种时段类型:长时段(又称结构),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但在历史上起经常的深层制约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中时段(又称局势),指在较短时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两百年)内起伏盛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现象,

包括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等,它们对历史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短时段(又称事件),则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战争、条约、地震等等,它们有如“闪光的尘埃”、海面上的浪花,转瞬即逝,对历史进程影响很小。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无非是人在一定的时空内的活动,空、时、人三者构成一个有机体。但他并非地理决定论者,因为他一方面强调地理气候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另一方面也承认人们(集体)塑造和利用环境的可能性,因而他实际上还是想通过三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历史,尽管他始终未能很好地阐明这种辩证关系。

年鉴学派以其创刊于1929年的史学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而得名。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年鉴学派经历了三代人的历史变迁。第一代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力于反叛传统的实证史学,主张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提倡写“全面的历史”,即一种囊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的历史,反对写狭隘的政治史。在实践上,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社会史和心态史上,并对心态史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写出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们》(布洛赫,1924)和《拉伯雷的宗教: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费弗尔,1942)等心态史名著。第二代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继续贬抑政治事件和英雄人物,热衷于研究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结构,同时也出现了忽视心态、文化的倾向。到第三代,布罗代尔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人们在继续重视经济社会史的同时,开始回过头来给予政治史一定程度的关注,因为他们发现事件并不像前辈们说的那样一钱不值,由此出现了向“政治史”或“事件史”的某种“复归”。但由于还是年鉴学派,他们现在已不再用传统史学的老眼光来看政治史了,如勒华拉杜里提出要注意阐明“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雅克·勒高夫主张建立新型的政治史,包括对结构、社会分析、字义学和权力学关系的研究等。与此同时也显然与此相关,一度被冷落的

心态史又重新趋热,并出现了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趋势。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第三代年鉴学派在70年代初再度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号,以明示自己的不落窠臼。于是此后的年鉴学派往往也被称作“年鉴—新史学派”。

年鉴—新史学派的扛大旗人物是雅克·勒高夫,而他主要又是以心态史专家著称的,写过《中世纪西方的家庭和亲缘》(1977)、《炼狱的产生》(1981)、《基督教的鼎盛》(1982)等著名心态史作品。所以心态史学现在常常被直接用作年鉴学派的代名词。那么,“心态史”又究竟是什么呢?年鉴学派的说法至今还不太一致,原因是“心态”(mentalité)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模糊性。有人认为它就是意识形态;有人认为它比意识形态的范围更广,意识形态只是它的一部分;还有人认为它是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概念,尽管二者之间有着广阔的重叠部分。后一个观点是法国革命心态史著名学者米歇尔·伏维尔的看法,其影响也比较大,很值得我们重视。

伏维尔曾对心态史学作过这样的描述:

心态史学乃是一种“第三层次”的史学,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次的史学。人们在研究了经济或社会结构的层次之后才能达到这一层次。这是一种极其引人入胜的史学,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史学,一切机械的或简单化的归约都受到了它的挑战。它已经涉及了一些明晰的思想层次,如精英人物和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及文化传播,而它现在正愈来愈转向群体的无意识。^[3]

伏维尔这里所说的“第三层次”史学,是当今法国史学界一个流行语。在极端重视长时段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们看来,历史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传统的事件史,属于短时段史学。第二层次是经济的或社会的历史,即在一种“缓慢时间”的“半静止状态”中变动的“缓慢的历史层次”,属于中、长时段史学。第二层次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便进入了“长时段的囚牢”——心态史,它所

揭示的是一种更彻底的长时段历史,这种历史具有“稳态”和“抗拒变化”的特征,因而日益被视为对历史作长时段研究的优先领域。这种第三层次的史学也研究一些明确的思想观念,但最终令它着迷的,还是那种潜在的、朦胧的社会文化层,那里充斥着各种未曾道明的意念,各种暗中支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习惯趋向——简言之,它最关注的是藏在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举止背后的所谓“群体无意识”。

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也讲“群体无意识”,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的发明。但心态史学讲的群体无意识和精神分析学并无瓜葛。实际上它是另一位法国革命心态史学大家菲力普·阿利埃斯的独立创造。据他自己解释,这种群体无意识,指的是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倾向,这些倾向之所以不曾为人们所意识到,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人们遵循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采用的或不准使用的感情和幻想的表达方式”。他还特别指出,这些东西是“以前埋在集体记忆深处的情感”,是一些“无以名之的智慧”,“这些智慧并不是超越时间的抽象智慧或真理,而是各种经验的智慧”。^[4]既然是“经验的智慧”,阿利埃斯的群体无意识就和荣格的群体无意识有了明确的界限,因为后者的基本属性就是先验性,是一种“完全通过遗传而存在”的东西。

作为法国革命心态史的一位大家,伏维尔和年鉴—新史学派有很多相通之处,尽管他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在史学中确定短时段和长时段的新辩证关系”,亦即政治事件和群体心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伏维尔看来,实际上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统一。^[5]所谓大众文化,也就是群体的无意识,它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

于那种已得到理性的加工和表达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变动不居,富于创造性,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年鉴学派的伟大功绩在于它揭示了历史时间的“多元性”,但一般说来,主要就是这两类历史时间、两种不同节奏的演进,在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和相互转化中,演奏全面历史“交响乐”的主旋律。可见,伏维尔的史学观点同前面提到过的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只是,由于伏维尔专门致力于法国革命心态史(实际上就是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他在“阐明‘事件’与‘结构’之间关系”方面显得更踏实、更突出一些。

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为什么法国革命史学近年来特别关注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我看来,所谓“政治文化”,既可理解为“政治的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政治与文化”——这个术语本身就含蓄地体现了短时段和长时段、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辩证结合。因为“政治”作为短时段的事物,无非是精英文化的一个方面的体现或创造物,而“文化”,就其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的意义而言,乃是大众性质的,它体现着或本身就是社会最深层的集体心态,因而是充满惰性、趋于静止的。如果研究历史终究还不能不研究政治事件、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的话,那么这种研究也终究不能撇开当时社会大众的政治心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集体政治心态,就这样成了当今深化法国大革命史学的一条备受学界青睐的重要途径。

(二)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性

在当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众多研究者中,美国宾州大学历史教授林·亨特(Lynn Hunt)女士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她在1984年推出的力作——《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全新的法国革命历史画卷,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迪。

亨特认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便是它创造的“革命经验”——那是现代大多数政治观念和实践的源头;而“如果说在革命经验中有什么统一性或一致性的话,那么这种统一性或一致性就来源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行为期望。……表达并塑造着群体意向和行动的各种价值观念、期望和含蓄的规则,就是我称之为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东西。这种政治文化提供了大革命政治行为的逻辑。”^[6]

亨特极为重视政治文化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史学中的地位,是因为她认为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历史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她这样指出:“革命在法国对经济的成长或政治的稳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它所确立下来的毋宁是民主共和的动员潜能和革命演变的惊人强度,它给后世留下的最显著的遗产是民族新生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和共和主义的礼仪,以及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警察国家之类的政治方面的术语、习惯、观念模式和行为样式。”^[7]

这种新政治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至今恐怕还没有人能够说得很清楚、很全面,但它的存在及其对世界历史发生过的重大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很显然,法国大革命以后世界历史上的许多次重大革命运动,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拉美独立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乃至20世纪的中国革命等等,不同程度上都是用法国大革命的语言说话和按法国大革命方式行事的。列宁曾公开声称雅各宾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前驱,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倡导的“公开性”、“透明度”等原则,也还是雅各宾当年的政治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红旗,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风行一时的“小红帽”;世界政治至今还在习用“左派”、“右派”、“恐怖”、“热月”这一类法国革命者创造的政治概念;……如此例证,俯拾即是。

应当指出,林·亨特把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归结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的创造,为我们认识法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意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其他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这场革命在摧毁封建制度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激进性或彻底性。至于造成这种激进性或彻底性的原因,传统的解释方法是将它归结为旧制度末期法国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如弗朗索瓦·基佐所言: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不能为抵抗君主专制主义或建立并实行自由而团结一致。它们势不两立,一个阶级不承认任何平等,另一个阶级则不承认任何特权”。^[8]其实从复辟王朝时代起,这种以阶级矛盾来解释法国革命起源的理论就一直为差不多所有的法国革命史学者所遵循。然而,自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考本发表《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一书以后,这种传统解释就在西方史学界受到了许多“修正派”学者潮水般的攻击。他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在革命前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融合成同一个社会经济集团,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已不再有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因而说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纯属意识形态的虚构。^[9]尽管仅从经济角度并不能根本否定法国大革命反封建主义的社会意义,但修正派的研究毕竟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革命前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那么大革命那种异乎寻常的激进性或彻底性又究竟缘何而来?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即使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在大革命前夜已经不那么清晰,那也不能想象这两个阶级自出世之日起便是亲兄弟,最终的逐渐融合并不能把它们在历史上持续数世纪之久的争斗一笔勾销。中世纪法国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市民曾长期斗得你死我活,这种激烈的、充满血与火的长期斗争环境难免会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心理积淀,即一种关于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群体无意识,而精神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又意

味着这种群体无意识在其所由产生的领主和市民、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趋于平缓甚至消失之后,仍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存留和延续,并将继续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

法国大革命时代盛行的“决裂”信念,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关于这种“决裂”信念,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法国人在 1789 年作出了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作出过的巨大努力,来斩断他们的命运,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为达此目的,他们时时小心,处处设防,尽可能不把任何旧事物带到新环境中来;他们给自己加上种种限制,以期养成一套完全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习惯。总之他们穷思极虑地要对自己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10]

这种决裂信念,作为法国革命者政治行为的逻辑基础,无疑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但我们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这种决裂信念始终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实际上,真正的同旧传统的“完全决裂”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此外还应看到,虽然参加大革命的人们个个都在喊“决裂”,但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决裂信念客观上也存在着深浅程度的差异。实际上,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破坏旧世界和按照什么样的蓝图建立新世界的问题上,革命阵营内部始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歧、对立甚至生死搏斗。那么为何还要强调有一种“各派共有”的决裂信念的存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当时法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斗争无论有多么尖锐,都没有达到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的矛盾。正是这一对主要矛盾,决定了当时的法国革命派具有大致共同的政治认识和感情,从而决定了革命政治文化的相对统一性,而革命派内部种种不尽一致,甚至尖锐对立的政治选择和政治理想,实际上也只具有在相对统一的

全国政治文化下面的各种亚政治文化的意义。^[1] 尽管某个占从属地位的亚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由于一系列特殊环境因素的推动,也可能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事件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总的历史条件未变,时代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亚文化的主导地位终究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的,终究还是要让位于该时代真正占主导地位的亚政治文化。

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中,除了“决裂信念”这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对革命政治文化的许多原则性概念的形成以及大革命整个发展演变进程都有相当直接的促进意义,只是以往并不为人们所重视。这就是当时始终笼罩在革命者心头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意识有其直接的环境基础:旧制度各种代表人物的深刻敌意,层出不穷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欧洲封建君主势力的包围和军事进犯,国内的王党叛乱、联邦派暴动,乘人之危的投机商哄抬物价制造饥荒……这一切,不能不使革命者时刻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同时,这种危机意识还有其深层的经济和民众文化的根源。由于小农经济生活条件的严酷和现代大众宣传媒介的阙如,法国民众自古以来就对“阴谋”的话题特别敏感。这种“阴谋忧虑”每每与粮食有关:关于奸商有意囤积粮食制造饥荒的谣传,是被称作“面粉战争”的饥民暴动和自发限价行动的经常的动因。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旧制度危机的深化,粮食问题上的阴谋忧虑渐渐转到国家政治方面。当时王权政府和高等法院常常为粮食贸易政策闹摩擦并以玩弄“阴谋”相攻讦,越发加重了人民群众对粮食阴谋的担忧和对政府的怀疑。大革命爆发后,人们在粮食问题上的阴谋忧虑迅速发展成为对贵族反革命的阴谋忧虑,这种忧虑和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对贵族反革命的恐惧感汇集到一起,便形成了法国革命时代特有的危机意识。

弗朗索瓦·孚雷在《思考法国革命》(1978)一书中提到:阴谋是

民主政治的不可避免的反原则,意思是说只要有民主政治,就必然有其否定物阴谋的存在,有关阴谋的观念是和民主政治相伴而行的,这反映了人们对反民主的隐蔽势力的警惕和忧虑。^[12]亨特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并以美国民主政治经验(美利坚共和国就没有像革命法国那样持久地关注反民族的阴谋)为例提出了批驳。她认为,法国革命者的阴谋忧虑具有超强的特点,表现在一切“有组织的政治”(即政党政治)都因被视为“阴谋活动”、“密室策划”而失去了任何合法性,这和美国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而究其原因,亨特认为除了两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之外,法国革命时期特殊的现实政治环境也有重大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18世纪大西洋两岸受过教育的人们都有这种对于“有组织的政治”的矛盾心理。似乎人人都惧怕密室政治、秘密策划和派别活动。但法国的特点在于:这里不曾有过“辉格党政治学”,人们不熟悉行政人员“在朝”与“在野”的调整机制,也没有党派分赃制和组织利益集团这方面的习惯。而且,从旧制度狭隘的政体向实行貌似无限制人民参与的新政体的过渡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政治动员的新颖,社会冲突(如我们谈到过的那些制造饥荒的阴谋)的激烈,以及对法国人正在从事一场旷世未有的新事业这件事的大力宣扬——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新生的法兰西民族和她的假想敌之间的斗争带上了一种特别突出的分裂性色彩。如果说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是觉得政党政治和派别竞争的出现难以为人接受的话,那么法国人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则是毅然决然的拒斥。^[13]

总之,法国革命特有的决裂意识是其特有的危机意识的重要根源,而这种危机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一种对于贵族阴谋的极度的担忧。也正是在这种政治心态的导引下,法国革命者异乎寻常地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一如亨特所言: